

· 中国禅学研究系列丛书 ·

《六祖坛经》 研究

第四册

广东新兴国恩寺 编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中国禅学研究系列丛书

《六祖坛经》研究

(四)

广东新兴国恩寺编

主 编：释如禅

副主编：吕铁钢

湛 莹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目 录

以禅宗方法整理《坛经》 / 1	任继愈
《敦煌写本〈坛经〉原本》整理说明 / 5	周绍良
敦煌写本《坛经》之考定 / 8	周绍良
敦煌本《六祖坛经》是慧能的原本 ——《敦博本禅籍校录》序 / 25	周绍良
《敦博本禅籍录校·南宗顿教最上大乘 〈坛经〉一卷》说明 / 41	邓文宽 荣新江
《敦煌新本〈六祖坛经〉》序 / 50	周绍良
《敦煌新本〈六祖坛经〉》自序 / 53	杨曾文
《敦煌坛经合校简注》序 / 59	杜继文
敦煌《坛经》合校说明 / 66	李 申
《坛经》版本刍议 / 69	李 申
西夏文《六祖坛经》残页译释 / 84	史金波
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《坛经》、 《南宗定是非论》等文献的学术价值 / 100	杨曾文
《坛经》管窥 / 109	韩昇
敦煌写本《坛经》是“最初”的《坛经》吗？ / 124	拾 文
敦煌本《坛经》是否为传授本 / 136	[日]伊吹敦
敦煌本《六祖坛经》读后管见 / 144	[台湾]潘重规
敦煌《坛经》随想录 ——反省与展望 / 165	[韩国]金知见

- 关于敦煌本《坛经》 / 188 方广锬
- 关于《坛经》若干问题的研究 / 211 洪修平
- 近年敦煌本《六祖坛经》整理工作评介 / 240 邓文宽
- 《坛经》考 / 259 [日]宇井伯寿 杨曾文选译
- 当代关于《坛经》作者的一场争论
- 兼评胡适禅宗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失误 / 279 罗义俊
- 评胡适的禅史研究
- 1969年争论《坛经》的回顾与思考 / 295 顾伟康
- “《坛经》考”质疑
- 读胡适《坛经考之一》 / 312 黄德远
- 《〈六祖坛经〉诸本集成》说明 / 326
- [日]柳田圣山著 俊忠译
- 评《敦煌新本〈六祖坛经〉》 / 334 陈士强
- 英译《六祖坛经》版本的历史研究 / 340 高秉业

以禅宗方法整理《坛经》

任继愈

近半个世纪,《坛经》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兴趣,研究者遍及海内及欧亚地区,这一趋势与思想界关心禅宗的研究有关。“禅”这一专门用语,已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。禅宗研究的兴起又与国际哲学界关心直觉主义、神秘主义思潮相呼应。

禅宗这一宗派与中国隋唐佛教天台、华严、法相并列为四大宗派。中国佛教义理之学,内容丰富,影响深远的也只有这四个大的宗派。^①

影响深远的这四大宗派中,禅宗比其他三派更具有东方汉传佛教的民族特色。

禅宗的思想方法不重思辨推理的过程,而在直探本源的体认。禅不是从概念上引导信徒走向宗教境界,而是生活经验的升华心灵感受走向宗教境界。禅宗教人,更多用力于性情、人格的培养,也就是内心的自觉,而不大注重外在权威的灌输,借外在权威迫使鄙劣欲念消退。

^① 律宗、净土宗更注重宗教实践,密宗后起,影响范围也较小。日本学者著作中认为中国有俱舍宗、成实宗、三论宗,事实上并不存在。

在这一点上,禅宗与净土宗存在最大的区别,与其他各宗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。

如果问禅宗教人解脱法门是什么,简单一句话,就是自己解脱。如果自己不会解脱,不敢解脱,佛祖释迦牟尼对这种信徒也无能为力。自行解脱,要有方法,更要有自信心。禅宗教人,不允许信徒们问自己“我能办得到吗”,而是要人们坚定信心:“我一定办得到!”这种宗教信仰的决心、愿力,原始佛教本来也有。如佛教经典中经常讲到“天上地下,惟我独尊”。且不必追究新生的婴儿有没有生下来就会说话、会走路的本领,神话归神话。但是,我们可以承认佛教教人树立坚定的宗教信仰,不要受外界任何干扰。不论是社会习惯的束缚,还是最高权威的压力,都不能动摇自己的信心。禅宗对佛教教义中的这一点是吃透了的。正是抓住了这一点,才使得另外的许多宗派,即使不赞成禅宗的一些主张和教育方法,却不能不认同其在佛教中的地位。

禅宗从慧能创立南宗开始,即重视《金刚经》,慧能的老师弘忍传教,以《楞伽》、《金刚》并重,有所变革。可以说明,禅宗更着重般若空宗“以遮为表”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。以否定表达其所肯定;以不明说表达其所要说;以无为启发其有为。这也是印度般若学派的一贯宗旨。禅宗自称“教外别传”,虽曰“别传”,它传的还是佛教的主要部分。中国隋唐以后,宗派林立,其他各派对这个土生土长、来历不明的宗派啧有烦言,却不敢轻视,因为它抓住了佛教精神的一部分。

禅宗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,使它选择适合该宗派的

传教方式。读禅宗典籍要符合禅宗思维方式,对禅宗和尚语录要与其他各宗派的著作也应有所区别。有的宗派特别注意语义明晰,心理描述,心情变化,遣词、翻译原著,必须字斟句酌。例如佛典旧译“观觉”,玄奘译为“寻伺”,意在区别心理活动的细微差异。这种认真的态度可取,也可贵,但对禅宗并不适用。

研究禅宗,要按禅宗的思维方式、表达方式,还要注意禅宗善于因材施教、因病投药的教学特点。同一问题,对不同提问者往往记录着不同的答复,有时相近,有时相反。

早期禅宗大师多见识高超而文化低下。我们看到唐人手抄的禅宗语录,错别字迭出,甚至文义不全。这种现象在其他宗派的手抄本中极少出现。这一事实,给禅宗研究者带来不少困难。正因为如此,禅宗经典文献《坛经》才会产生众多版本,人们常见的即有十几种以上。近代学者用了差不多近百年的时间从事校勘、订正。大家力图向社会提供一个可信的版本,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,他们的努力值得尊重。

禅宗语录,从慧能开始,就提醒人们不要死抠字句,而要掌握他讲话的精神实质。这也是佛教涅槃“四依”中的“依义不依语”的古训。禅宗原来的衣钵相传,应当是早期禅学没有广泛普及的情况。安史之乱后,中央政府削弱,天下分崩离析,这一学派不专事经典,直指心印。禅学弟子各凭师傅的传授,结合自己的理解,从事传教事业。不同的版本各呈异彩,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。禅宗《坛经》有没有一个定本?不可能有。中原地区战乱

不断,文献保存不易,敦煌地区相对安定,千佛洞保存的手抄本足以反映河西地区流传的《坛经》面貌。

《坛经》的校勘任务,不在于恢复《坛经》的本来面貌,因为本来面貌很难说。《坛经》作者慧能(惠能)就有两种写法并存。即使今天慧能复生,问他本人,名字如何写,慧能也回答不出,因为他不识字。我们当然不能断定两个“慧能”哪个正确。

是不是我们研究者就无所作为?也不是。我们应当根据禅宗思想体系,按照禅宗的思路,把《坛经》理顺。以禅宗方法整理《坛经》,尽量避免用汉学家、经学家的方法整理《坛经》,这是比较可行的办法。回头来看过去已出版的世上已流行的几种版本,最好避免用“篡改”等字样,尽量不相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标准本的《坛经》的假设。只能就现有的敦煌本《坛经》的错讹字句、明显错别字理顺。还要探索一下唐时民间流行的习惯语,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,人名称谓,地区、地名,通盘考虑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按禅宗的思路来整理《坛经》。不要理顺了《坛经》的字句,却背离了禅宗思想。李、方二位的《坛经合校》本,应当看作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中的又一枝奇葩。这个版本还不能成为定本,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通顺可用的新版本,为有心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导游图。有了导游图,路还要自己走,判断、评论,还要作者自己拿主见。

(原载《敦煌坛经合校简注》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年)

《敦煌写本〈坛经〉原本》 整理说明

周绍良

《坛经》是禅宗一部重要典籍，是记载六祖慧能为奠定禅宗的基础而说法的一本书。它一直流传一千多年，宋代以前学者研习《坛经》的情况不详，但自宋代以后，大家研习的都是经过人们整理过的本子，最早慧能说法而由法海集记的原本，从来没有被人追踪而予以认定。由此可见，慧能的禅法思想还没能给人们以正确的认识。本世纪初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出现了唐五代写本《坛经》，这是一桩重要发现。但经过七八十年，始终没有人对之加以认定，一直把它放在疑似之间，原因是没有人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。

《坛经》流传的一些整理本，全是宋代或以后的人加工的本子，从内容审之，它应该就是从敦煌所发现的本子而加以整理的，字数是加多了，但从框架看，显然是由敦煌这样本子增补而来，文采是增加了，错衍是没有了，说法更为圆融，增加了经典的分量，但实际慧能是一位识字不多、读经很少的修持者。他主张由参悟而达到解脱的

境界,是不主张立文字的。我们不要把他的说法内涵要求极其圆成,这是不符合实际的。因之敦煌所发现的本子,正是法海集记的原本,这是毫无疑问的,现在为要搞清楚慧能禅宗思想,有必要把这个本子加以整理。

敦煌莫高窟所出《坛经》共有五个本子,它的抄写早晚,今依顺序列之于下:

一、北京图书馆藏残片一页,编号有字七九号。当是盛唐时代经生抄本,字体工整,每行十八(七)字,存四行半。用黄色写经纸抄录。大概由于发现抄写中间脱落一段,因而割下弃置。此虽一残页,但抄写年代较其他诸本《坛经》为早,显然是严肃认真之抄录本,而非一般个人学习使用之课本。由此可以说明在盛唐时代,当时流行之《坛经》即此本也。今从时代考定,此本当列为诸本之最早者,但不入校。

二、北京图书馆藏卷子本,编号冈字四八号,是用敦煌地方习用的写经纸抄写的,首缺,尾未抄完。从形式看,可能是敦煌地方僧人所录,时间当在唐代晚期,工整亦不及前一本残页。

三、敦煌博物馆藏册子本,馆藏编号为第〇七七号,收集在一本禅宗资料合集中,包括《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》、《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(见)性坛语》、《南宗定邪正五更转》、《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》(尾题)和《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共五种,字迹工整,但显然不是经生手笔;错误较少,抄写时期不会太早,可能是五代时期,原为敦煌人士认子宜旧藏。

四、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所藏一本,亦为册子本,首尾完整,中间缺落三行文字。字迹拙朴,缺落字甚多。抄

写时间与敦煌博物馆所藏一本相近。

五、原旅顺博物馆所藏原日人大谷光瑞所获一个册子本,据记载,原共 45 页。此件于 50 年代,由于调拨移动,导致迷失,至今下落不明,现仅存照片首尾三开(照片二帧),且末尾并非《坛经》,但具有抄写年代:“显德五(六)年己未岁三月十五日”。这是惟一有明确年代记载的本子,形式与前二本相同,从形制、书法、纸张、装帧等研究,这三个本子似乎不是敦煌的产物。

依据这五个本子抄写内容看,虽然各有些脱落衍误,但从整体而论,应该都是属于一个系统的本子,来源是一致的。从这里可以考定,在五代以前,《坛经》的流传,显然没有其他的本子,不单敦煌地方抄本是这个系统的本子,包括非敦煌地方抄写的《坛经》也都是这个本子。因之可以考定,这就是法海集记的原本。

现在整理方法只是用敦煌所发现的四个本子,以敦煌博物馆藏册子本为底本,相互校定,取长废短,加以补缀。其有衍误无法校订者,就文义略加注明,而不取宋代及以后人的考定。也许所注相同,但可见古人今人认识是一样的。今成此本,以供研究《坛经》者继续整理之需。

至于整理校定体例,凡是校出的问题,一例用校记说明之。诸凡错误字均将原文录出,而将改正之字作注,以“()”符号表现之;增补之字则用“[]”符号表现之,均在校记中予以说明。其臆改、臆补之字,亦用“()”、“[]”符号表现之,但不出校记,以为识别。

(原载《敦煌写本〈坛经〉原本》文物出版社 1997 年)

敦煌写本《坛经》之考定

周绍良

敦煌发现的古写本禅宗六祖慧能《坛经》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本《坛经》，现存其他诸本，是没法与之比拟的，也都没有资格用这些本子来质疑这本古写本《坛经》，因为再没有充分证据来对它说短论长，除非考证出这是一本伪造的，那又另作别论。

可是这个写本已经发现了近一个世纪，研究《坛经》的人很多，而它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，相反地却遭到相当的冷落，认为这只是一部“古简本”而已。原因是一些人受到相传古原本是一种繁本说法的蛊惑，而没有从考古学、历史学、语言学、文学、宗教学、比较学等方面学科，认真地对这本《坛经》加以研究。

过去郭朋同志曾花了一些功夫对敦煌本加以校订，成《坛经校释》一书，但他只是就书论书，未能从繁简问题稍加考虑。接着是杨曾文同志，他花了大量力气整理了《敦煌新本〈六祖坛经〉》，在研究、校订上都有所推进，但也未能对真伪方面作进一步考虑，所以也没有真正突破。接着是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，在他得到最后发现的敦煌

博物馆所藏一本比较完整的《坛经》后引起了重视,开始花功夫校勘定字,写出一本《敦煌〈坛经〉新书》。在这个基础上,他客观地从各个方面予以考虑,然后写出一本“附册”,发表了《敦煌六祖〈坛经〉读后管见》一文。这是一篇在不否定繁本说的情况下,对这最古老的《坛经》加以认定的论文,是在研究《坛经》版本方面的一个突破,也是实事求是的论断。

现在为推进对《坛经》的认识,将潘先生的看法仔细地抄录如下:

潘先生认为,早期《坛经》是所讲的笔录,随听随记,不分章节,文字也较质朴,接近口语。流通问世的刻本,则力求悦目易晓,故章节分明,文辞亦多加修饰,内容情节更是刻意增添。增添的情节中,……有的则是刻意的夸张,或荒诞的传说。刻本愈后,原本的真相改变愈多。……我们看敦煌写本六祖说他往黄梅求法时,只有简单几句:

惠能闻说,宿业有缘,便即辞亲,往黄梅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。

惠昕本便补充了辞亲以前一段合情合理的叙述:

惠能闻说,宿业有缘,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,令充老母衣粮,教便往黄梅礼拜五祖。惠能安置母毕,便即辞亲。

又如神秀作偈,未得印可,五祖命再作一偈。构思不得时,敦煌本说:

秀上座去数日,作不得。有一童子于碓坊边过,唱诵此偈。

惠昕本作：

神秀作礼便出。又经数日，作偈不成。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犹如梦中，行坐不乐。复经两日，有一童子于碓坊边过，唱诵此偈。

中间刻意描写神秀失意不安情况，不似惠能说法口吻，显为惠昕本后加。又如六祖自言拜读神秀偈语，并自作一偈，请人题壁，敦煌本只说：

童子引能至南廊下，能即礼拜此偈。为不识字，请一人读，惠能已即识大意。惠能亦作偈，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著。

到了惠昕本，便详细说出了读偈人的姓名履历。它说：

童子便引惠能到南廊礼拜偈颂，为不识字，请一上人为读，若得闻之，愿生佛会。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，便高声读。惠能一闻，即识大意。因自言亦有一偈，望别驾书于壁上。别驾言：“獼獠：汝亦作偈，其事希有。”惠能启言：“别驾：若学无上菩提，不得轻于初学。俗谚云：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没意智。若轻人，即有无量无边罪。”张日用言：“汝但诵偈，吾为汝书于壁上，汝若得法，先须度吾。勿忘此言！”

又如六祖得传衣法后南归，敦煌本只说：

若住此间，有人害汝，汝即须速去。能得衣法，三更发去，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。登时便五祖处分：“汝去努力，将法向南，三年勿弘此法。难起在后，弘化善诱迷人，若得心开，与吾无别。”辞违已了，便发向南。

惠昕本便添了许多描写,说:

若住此间,有人害汝,汝须速去。惠能言:“本是南中人,久不知此山路,如何得出江口?”五祖言:“汝不须忧,吾自送汝。”其时领得衣钵,三更便发南归。五祖相送,直至九江驿边,有一只船子。五祖把橈自摇。惠能言:“请和尚坐,弟子合摇橈。”五祖言:“只可是吾度汝,不可汝却度吾,无有是处。”惠能言:“弟子迷时,和尚须度;今吾悟矣,过江摇橈,合是弟子度之。度名虽一,用处不同。惠能生在边方,语又不正,蒙师教旨付法,今已得悟,即合自性自度。”五祖言:“汝今好去,努力向南,五年勿说佛法。难起已后,行化善诱迷人,若得心开,与吾无别。”辞违已了,便发向南。

惠昕本还有补缀事实,附注在一章之末,预备插入正文的情况,如敦煌本云:

惟有一僧,姓陈名惠顺,先是三品将军,性行粗恶,直至岭上来趁,把著惠能,即还法衣,又不肯取:“我故远来求法,不要其衣。”能于岭上,便传法惠顺。惠顺得闻,言下心开。能使惠顺即却向北化人。

惠昕本作:

惟一僧,俗姓陈,名惠明,先是四品将军,性行粗恶。直至大庾岭头,趁及惠能。便还衣钵,又不肯取,言我欲求法,不要其衣。惠能即于岭头,便传正法。惠明闻法,言下心开。惠能却令向北接人。惠能后至曹溪,又被恶人寻逐,乃于四会县避难。经五年,常在猎人中;虽在猎中,每与猎人说法。至高宗

朝,到广州法性寺,值印宗法师讲《涅槃经》,时有风吹幡动,一僧云幡动,一僧言风动。惠能言:“非幡动、风动,人心自动。”印宗闻之悚然。

惠昕本加叙了许多情节之后,在悟法传衣门的末尾,又用小字双行记云:“祖谓明曰:‘不思善,不思恶,正与么时,如何是上座本来面目?’明大悟。”这个附注,后来刻本《坛经》便都改编成为正文了。像这类添加情节的文字,显然都是惠昕本为《坛经》做的补充。其他文字间的异同,由于敦煌写本文辞质朴,较近口语;刻本经后人润色,则较近文言。如敦煌本云:

使君问:“法可不如是西国第一祖达摩祖师宗旨?”大师言:“是。”“弟子见说,达摩大师化梁武帝,帝问达摩:‘朕一生已来,造寺、布施、供养,有功德否?’”

惠昕本作:

韦公曰:“和尚所说,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?”
师曰:“是。”公曰:“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,帝问曰:‘朕一生造寺供僧,布施設斋,有何功德?’”

惠昕本于“可不如是达摩大师宗旨”下加一“乎”字,“大师言是”下加“公曰”二字,“弟子见说达摩”改为“弟子闻达摩”,皆是润色口语,变成文言。

又如敦煌本:“神秀师常见人说,惠能法疾直指路。”惠昕本作:“秀闻能师说法径疾,直指见性。”把“见……说”改为“闻”,很明显的都是把口语改为文言。从最早的刻本来观察增改的情况,更可证明敦煌本确是现存行世的最早写本。

以上是潘重规先生提出惠昕本所增添之处,这些都是敦煌本所没有的。当然这些增添,绝非慧能当时实录,因之难免不实,老实说也就接近妄补,这是对《坛经》整理者不应该有的态度。

我对潘重规先生所提是十分赞同的。老实说,他还是以学者治学态度,仅否定后人对《坛经》之妄补,却没有进而肯定敦煌本即慧能原本,这是学者虚心的地方。

我对敦煌本《坛经》是完全肯定的,我认为它就是慧能原本。过去也写过一篇文章,讨论它的可靠性。现在摘录于下。

敦煌本《坛经》,它应该是“原本”,是惟一的“原本”,在宋惠昕整理《坛经》之前,再没有其他原本,这是可以肯定的。

除了这一点之外,我们还可以在方言、俗语、历史背景等方面,来认识《坛经》是唐代作品,而惠昕又是怎样去整理改动的。如在开头部分:

遂遣惠(慧)能随众作务。

“作务”一词在宋代已很少用。

秀上座去数日,作偈不得。

这里“去数日”在惠昕本上被改为“经数日”,“不得”被改成“不成”,这已经是宋代语言了。

先是三品将军,性行粗恶,直至岭上来趁,把着慧能,即还法衣,又不肯取。

“把着”意即“捉住”,惠昕大概嫌其不文,把这句完全删去,以致语意不相衔接。又如:

大众愕然,莫知何事。大师曰:“大众大众作意